

的长辈,我对他们也很尊重,也很同情他们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。他们夫妇比我父母去世都晚,但他们的儿子、女儿都年长于我,现应过 70 岁了。我出国后再没见过他们,希望以后回国能有机会叙叙旧。

三位姓氏声母为“L”的中国语言学大师

在中关村,我有幸与三位顶尖的中国语言学大师为邻,有趣的是他们的姓氏的声母均为“L”。他们分别是罗常培先生(Luo Changpei)、陆志韦先生(Lu Zhiwei)和吕叔湘先生(Lv Shuxiang)。而更巧的是,在英文单词中,语言(Language)、语言学(Linguistics)和语言学家(Linguist)也均以“L”字母开头。这不免让人产生联想:是否声母为“L”的姓氏更有机会成为语言学大师?这当然是玩笑了。

50 年代时,中国科学院四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——文学所、经济所、语言所和哲学所——在这四所的二层小楼都建好后,先后搬入中关村。这些所的很多家人也都随之搬来,其中罗常培先生住 14 楼,陆志韦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则入住 15 楼。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级研究员,1955 年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。

罗常培先生字莘田,号恬庵,满族,北京人。他生于 1899 年,1958 年去世,只活了 59 岁,但他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十分巨大。老舍先生在听到罗莘田(常培)先生病故的消息时,含着热泪写下了“与君长别日,悲忆少年时”的诗句。他在《悼念罗常培先生》一文中写道:“莘田与我是小学的同学。自初识到今天已整整有五十年了!叫我怎能不哭呢?”^①

罗常培先生是 1950 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,历任西北大学、中山



○ 罗常培(1899~1958)

^① 引自老舍著《悼念罗常培先生》。

大学、北京大学教授,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。他治学态度严肃认真,实事求是,不断进取。他的《汉语音韵学导论》是普及汉语音韵学的入门书。他的《普通语音学纲要》是一本结合本国语言实际的语音学教科书,此书的出版在推广普通话、调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、学习外国语,以及进一步研究语言学、普及现代语音学、丰富现代语言学的内容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巨大的作用。罗常培先生还十分重视汉语规范化、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的工作。在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上,他与吕叔湘合作的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》的报告,精辟地分析和回答了与汉语规范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,成为指导和促进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文献。



○ 陆志韦(1894~1970)

陆志韦先生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,生于1894年,卒于1970年。他在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,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东南大学、燕京大学教授及系主任。他长期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,是我国心理学的开创者之一。

在他40岁那年,司徒雷登推举他做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平津沦陷。北平、天津的一些国立和私立大学纷纷撤到内地。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,学校属于美国财产,

因而没有同时撤退。此时陆先生已不再担任代理校长,在这几年里,除了协助办理校务和带心理学研究生外,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。1941年12月7日深夜,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,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。日本侵略军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,当即宣布解散燕京大学,陆志韦等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,被关押在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。陆志韦先生等大义凛然、不畏强暴,决不屈膝事敌,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。后陆先生因病情恶化,由德国医院“取保监外就医”。他在受到监视和生活困难的环境中,仍然致力于学术研究。他的汉语语音学研究,除修订《古音说略》、《诗韵谱》等著作外,还努力研究近代汉语音韵,也就是关

于普通话语音史的探索。前人的研究,着重在文献的整理和版本源流的考证疏释,而陆先生则从语音史的角度探讨近代汉语语音的形成和发展规律。他在这一领域涉及的广度、深度是前所未见的。他把 11 世纪到 17 世纪出现的几种重要的音韵资料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,用现代语音学的原理对其所代表的音系进行描写和说明,提出对近代汉语音韵发展的新见解,写了《释中原音韵》等 9 篇论文,集成为《古官话音史》(他去世后出版)。书中的处理材料方法和分析研究程序,也有独到之处。1945 年 8 月 15 日,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他又开始领导复校工作,先后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、校长,直至到 1952 年燕大并入北大。其后,他调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,才干无法充分发挥,身心又遭受损害,1970 年不幸去世。1979 年,党和国家为其恢复了名誉。

他一生从事汉语音韵、语法和心理学的研究。研究音韵学先从修改高本汉中古音学说入手,否定了高本汉的 j 化说,提出了浊音不送气、纯力等没有 i 介音等一系列创见,为重出喉牙唇音拟了不同介音,创立了自己的体系。他编写的《北京单音词词汇》一书,不但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北京单音词典,而且是研究北京话语法的重要参考书。其著作《汉语构词法》归纳了汉语各种构词类型,阐明构词规律,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汉语词的结构方式的专著。

第三位“L”姓的是吕叔湘先生。他于 1904 年 12 月 24 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,可以说是家父的同乡。丹阳和溧阳同属苏南,中间隔了个金坛。中国科学院 1955 年的学部委员很多是江苏籍的,如华罗庚的故乡是金坛、家父是溧阳人。

吕叔湘先生住在中关村时我们两家有所往来,但不久他们就搬到端王府了,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。我印象最深的是,众所周知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前期主编和我国第一部语法词典《现代汉语



○ 吕叔湘(1904~1998)

八百词》的主编是吕叔湘先生,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最具社会影响的词典。他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研究,是近代汉语语法的开创人之一,所著《中国文法要略》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进行全面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。

1998年4月9日,吕叔湘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,享年94岁。

对老一辈的语言学家、社会科学家,我接触很少,了解不多,不能提供更多的点滴逸事。好在另一位中关村人、我的朋友周伯昆正好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失,现摘录部分他对三位“L”先生的回忆:

语言所从中关村搬到端王府后,我们家和陆志韦先生又成为不远的邻居,见面的机会比在中关村还多。我知道他很博学,对孩子也很和蔼,就常蹿到他的办公室或他家,他只要有闲,总会和我聊聊天。我也常问他一些老事。有一次,我看到一张1949年毛泽东到北京的照片,在欢迎的人中,陆志韦就站在毛的旁边。我就拿着照片问陆先生:“当时毛主席和您说话了吗?”他看了看照片说:“说了。”我刨根问底,问说些什么?陆先生说:“毛主席问我,你和司徒雷登还有联系吗?我连忙说,没有,没有。毛主席大笑说,给他写封信,老朋友嘛。”我问:“那您给司徒雷登写信了吗?”陆先生说:“你说呢?”止住话题,不再说了。我想他一定没有写,麻烦够多的了,再写信,能说清楚吗?

我当时是个集邮迷,不知听谁说陆先生有很多邮票。一天,我跑到他的办公室,想从他那里要点邮票。陆先生很爽快,把一堆信件放到我面前,给我一把小剪刀,说:“你自己要什么就剪什么下来,别把信剪坏就行。”于是我就从他的国内外来信的信封上剪下一些邮票。我有点得寸进尺,又想看看陆先生收集的邮票。陆先生把手一摊,说:“你来晚了,我的邮票都给人了,好几箱子呢。”我一听哎呀哎呀直叫,心想,要是他把邮票给我该多好!后来我才知道,他从20年代开始集邮到50年代放弃,期间他收集了许多国内外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珍品邮票,他曾担当过世界邮展的名誉董事。陆先生不仅是心理学家、语言学家,他



○毛泽东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在西苑机场

还是位集邮家。

我家是1971年从端王府搬到新源里的。我们家在47楼4单元1层，陆先生家人在同一单元的5层，可陆先生已在1970年底去世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陆志韦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受到冲击，1969年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息县“五七干校”，被分配看厕所。一代大学者竟然如此受侮辱，那是什么世道呀！那为什么他被分配看厕所呢？息县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，大粪都是好东西，常有附近的农民到社科院干校的厕所偷粪。陆先生那年75岁了，原来和我父亲一起分配种菜，实在干不了，就让他看厕所了。他怎么挡驾得了农民的粪叉和粪勺呢？结果大粪依旧被偷，他的处境可想而知，不久就神智不清、生活不能自理，只好送回北京。我母亲在端王府的院子里见过他，写信告诉我，说陆先生太可怜了，简直像是一个要饭的。

1970年4月，他夫人刘文瑞教授在北京病逝。同年11月21日，一代文豪病逝于北京端王府，终年76岁。当时我正好在北京，知道他去世，我很难过，也很无奈。我曾到他的住所外站了很久，但屋内空无一

人……

我父亲有两位恩师，一位是魏建功先生（曾任北大副校长），另一位就是罗常培先生。1950年科学院组建语言所，罗先生就带上我父亲到了语言所，因此我父亲对罗先生有特殊的感情。家父常带我到罗先生家串门，而罗先生高雅的举止和富有磁力的谈吐让我终身不忘。但我知道罗先生心情一直不好，什么原因我不知道，我想不外是政治运动对他的冲击。记得一次，家父带我去他家（中关村14楼），我看他家有一台收音机，样子不一般，就过去看。罗先生打开收音机让我听，他说，这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。原来这台收音机可以收短波，结果有人说他偷听敌台，还说可以发报，硬是把收音机拿走，把什么电子管给换了，结果现在和普通收音机一样。他问我，你说无线电收音机能发电报吗？我说，没听说过，不知道。他一面说一面摇头，一脸的无可奈何。

我父亲知道罗先生精神和身体都欠佳，就常去14楼看望他。有次他回来对家人说，罗先生今天很高兴，因为他的女儿上了《人民画报》的封面。后来我到语言所，真的看到罗先生女儿打网球的照片在1956年某期《人民画报》的封面上。那年年底，罗先生的儿子又结婚。那段日子，我看到他红光满面，很少有那样好的精神。可是反右开始，他又陷入了苦恼的境地，身体也越来越坏。家父对我说，罗先生真是难呀，看到自己的手下和学生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又无力保护，心里难受。他的手发抖，但还非常仔细地整理稿子和书籍。罗先生在他的书籍上夹上条子，条子上写着一些人的名字。他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，要处理文件和书籍，准备把他的藏书留给后人。1958年年底，罗先生因病逝世，我父亲当时在他的身旁……

语言所从中关村搬到端王府，吕叔湘先生的家随之搬到端王府夹道东面的一个小胡同。那里离他上班的地点步行也只有五、六分钟的样子。而我们家就住在语言所的对面，因此我经常看到吕先生上下班的身影。吕先生和别的老学者不同，他常与他的夫人肩并肩在外面散步，见到熟人打个招呼，老两口继续走路。当时我最不喜欢的一门课就

是语法,而吕先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语法专家,所以我最怕碰到吕先生,怕他突然问我一个语法的问题。在中关村时,我一见到他,叫他一声吕伯伯,赶快溜走。还好,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语法的问题。

到端王府后,和吕先生见面的次数更多,语法课也早没有了,所以我也不怕他了。见到他们老两口,我还主动走过去问个好,他们都很亲切地向我点点头,有时还聊上几句。他写过不少书,每出版一本都会送我父亲一本。有一次,父亲给我一本再版的《中国人学英语》,说是吕先生送我的。我打开一看,果然有吕先生的赠言:××翻阅 吕叔湘。当时学英语的书籍不多,这本书伴我有好几年,“文革”时不知被谁拿走,我到现在还觉得可惜。

我工作以后很少再见到吕先生,但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,知道他很忙,而且当了人大常委。80年代初,我读了巴金翻译的王尔德的《快乐王子集》,非常喜欢。我很想看看这本童话的英文版,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淘,突然想到吕先生,他精通英文,也许他那里会有。一次出差来北京,我去拜访了吕先生。他满头白发,但精神极佳。聊天时,我说很想看英文原版的《快乐王子集》,不知到哪里去找。他说:“我这里也没有,我想办法给你借来。”还说,“王尔德是唯美主义者,他的文章写得很美,但你读起来会感到深奥,没关系,慢慢看。”没过两天,吕先生来电话,说他从朋友那里借到了我想看的书,让我过去拿。我非常高兴,我也只是那么一说,可吕先生很认真,帮我借到了。我到吕先生家取书时,他开会去了,是他夫人把书给了我。我看了原版的《快乐王子集》中的几篇文章,得益匪浅。几个月后我回北京还书,吕先生出差了,我又没有见到。真没有想到,那次我的拜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吕先生……

中国科学院筹备人恽子强先生

化学家恽子强先生 1899 年生,1963 年去世。曾用名恽代贤,祖籍江苏武进,生于武昌城。恽子强先生 1920 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理化